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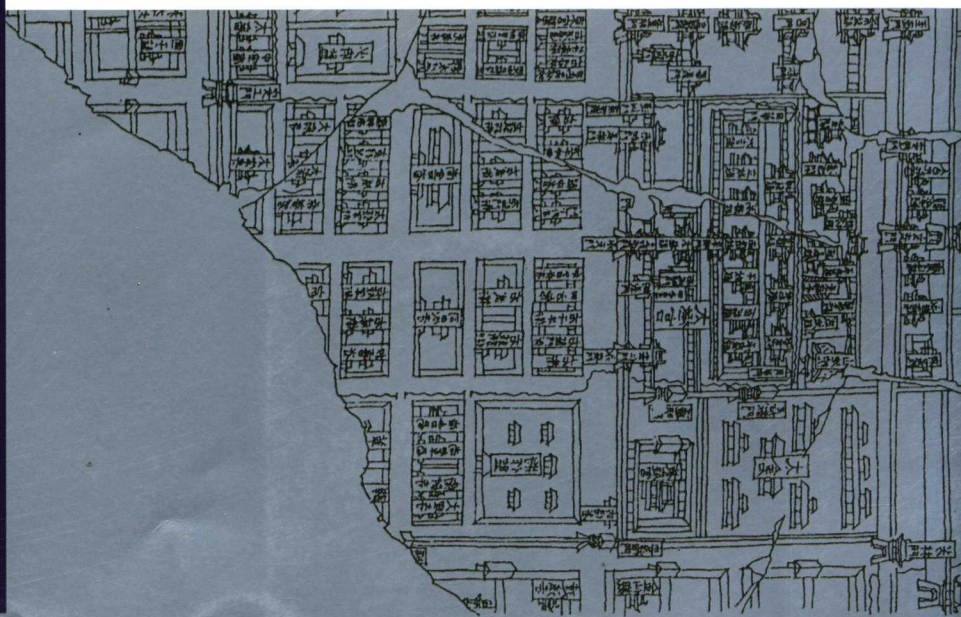
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大系 · 理论卷

主编 | 李百浩

体国经野：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与历史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N CHINA'S RURAL-URBAN RELATIONSHIP

叶 超 ■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大系·理论卷

李百浩主编

体 国 经 野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与历史

叶 超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南京·2014

内容简介

城乡关系不仅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是多学科研究的焦点。当前学界对中国城乡关系长期历史演化及其动因的研究相对欠缺。本书从历史和地理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在梳理四千年城乡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中国城乡关系长期历史演变的理论框架。通过系统分析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将其划分为对立、融合、再对立三个阶段,并论证了政策—文化和临海—贸易两组变量是制约从历史时期至今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主要动因。

本书可供城市与乡村研究、经济学、地理学、城乡规划等领域的研究者阅读和参考,也可作为相关科研院校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的教学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体国经野: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与历史/叶超
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9
(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大系/李百浩主编.理论卷)
ISBN 978-7-5641-5149-2

I. ①体… II. ①叶… III. ①城乡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F2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9815号



书 名: 体国经野: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与历史

著 者: 叶 超

责任编辑: 孙惠玉

编辑邮箱: 894456253@qq.com

文字编辑: 徐一娇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2号

邮编: 210096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出 版 人: 江建中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12.25 字数: 201 千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5149-2

定 价: 39.00 元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发行热线: 025-83790519 83791830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东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
联系(电话:025-83791830)

自序

迅速扩大的城乡差距是制约当今中国发展的突出难题,城乡关系研究因而显得非常重要。城乡关系涉及诸多方面,是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建筑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从不同透视镜观察事物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最大的困扰是难以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而且,现实问题是不分学科的。因此,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交叉与整合成为治学的一条必然路径。基于此,本书从历史和地理相结合的视角出发,在梳理城乡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解释城乡关系演变的理论——斯密框架,并以中国城乡关系长期历史演变进行实证。

本书是在我撰写的中国科学院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按我的禀赋和兴趣,我一直都很乐于思考理论、哲学、文化等“形而上”的问题。虽然我在硕士阶段就开始关注城乡关系问题,但直到攻读人文地理学博士学位期间,才对这一问题逐渐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刻的理解。经济学背景使我关注到斯密的经典理论,(人文)地理专业使我了解到地理要素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历史提醒我注意时间尺度和材料的重要性。种种机缘巧合使我最终得以完成论文,并有了这本书。

我很庆幸选择了人文地理学作为自己的专业领域。这倒并不是仅仅因为人文地理教学研究成为我后来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人文地理学的包容及其思想与方法的多样非常契合我的兴趣爱好。作为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人文地理学与很多学科都有交集,并衍生出经济地理、社会地理、城市地理、文化地理等子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文地理学更是经历了从计量革命到后现代地理学的诸多变革。对城乡关系以及类似的社会问题的理解与解决,人文地理学提供了非常新颖的理论思想和极其丰富的知识养料,这本书只是吸收了其中的一部分。

本书标题“体国经野”一词出自《周礼·天官》,原意是划分和界定城乡范围和边界,引申意为治理国家。这说明城乡关系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历史并不遥远,只是人类善忘。在这个一切快速向前的信息时代,过去,尤其是遥远的过去,常常是被遗忘的对象。博尔赫斯曾说:“所有过去都只是我们对它的记忆而已。”每个人对过去的记忆与理解是不一样的,因此有了各种关于历史的“理论”。我所理解的中国城乡关系史并

非若干断裂的片段。所以，本书极为大胆地将四千年城乡关系历史勾连起来，并试图为它寻找一个“统一”的理论线索。这是我对过去的一种“记忆”，现下我愿与读者诸君分享。

叶超

2014年5月4日于随园

目录

自序	/1
----	----

1 绪论 /1

1.1 背景 /1

1.1.1 现代化、意识形态和城乡关系 /1

1.1.2 全球化和信息化 /5

1.2 问题 /7

1.2.1 如何看待城乡关系 /7

1.2.2 如何选择主要变量 /10

1.2.3 选择什么理论 /12

1.3 方法论 /14

1.3.1 方法论的概念 /14

1.3.2 本书的方法论:历史和逻辑相结合 /17

1.3.3 本书研究思路与框架 /18

2 城乡关系:概念、方法和理论 /20

2.1 概念 /20

2.1.1 三个要点 /20

2.1.2 界定 /21

2.2 方法 /23

2.2.1 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23

2.2.2 本书的理论研究方法 /24

2.3 理论 /25

2.3.1 1940年代以前 /25

2.3.2 1940—1980年代 /37

2.3.3 1980年代以后 /40

2.4 小结 /44

3 斯密框架 /46

3.1 第三篇在《国富论》中的地位 /46

3.1.1 第三篇是“令人遗憾的失败”吗 /46

3.1.2 承上启下的第三篇 /47

3.1.3	阐释因果的第三篇	/48
3.2	斯密框架	/48
3.2.1	自然顺序	/49
3.2.2	演变过程	/52
3.2.3	斯密框架	/57
3.3	斯密对中国发展问题的分析	/57
3.3.1	疑问	/57
3.3.2	建议	/59
3.3.3	预期	/59
3.4	斯密框架的补充与延伸	/60
3.4.1	自然顺序是一种理想状态	/60
3.4.2	临海—贸易和政策—文化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作用方式	/61
3.4.3	临海—贸易和政策—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	/61
3.5	小结	/62
4	中国城乡关系的缘起	/63
4.1	城乡关系的发源	/63
4.1.1	从农业革命到城市革命	/64
4.1.2	中国城乡关系的发源	/67
4.2	城乡关系发源的一般性	/72
4.2.1	透视城市起源的假说	/72
4.2.2	由乡村到城市的演化逻辑	/74
4.3	中国城乡关系发源的独特性	/75
4.3.1	乡村与城市:文化与文明	/75
4.3.2	中外城乡关系的文化地理差异	/76
4.3.3	文化对政策的选择依附	/81
4.3.4	文化的区域分异与整合	/82
4.3.5	城乡关系变革的价值取向	/83
4.4	小结	/84
5	中国历史时期的城乡关系	/86
5.1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阶段	/86
5.1.1	阶段划分的主流范式与本书的取舍	/86
5.1.2	划分依据	/87
5.1.3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三个阶段	/88

5.2	三代城乡对立的形成与确立	/89
5.2.1	夏商时期城乡对立的逐步形成	/89
5.2.2	周代城乡对立的确立	/93
5.3	春秋战国时期城乡融合的形成	/98
5.3.1	城乡关系变化的背景	/98
5.3.2	城乡融合的驱动力	/100
5.3.3	城乡融合的形成与确立	/102
5.4	秦汉以来城乡融合的发展与变化	/110
5.4.1	“编户齐民”体制的发展与演变	/110
5.4.2	制度演变的文化效应	/120
5.4.3	一面临海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反复	/121
5.4.4	一面临海主导对外贸易政策的反复	/126
5.4.5	政策—文化与临海—贸易共同影响下的城乡关系	/128
5.5	小结	/129
6	中国近现代的城乡关系	/131
6.1	近代城乡对立的形成	/131
6.1.1	近代城乡关系变化的动力与原因	/131
6.1.2	近代城乡对立的形成	/137
6.2	现代城乡对立的确立与变化	/142
6.2.1	二元结构体制的建立与固化	/142
6.2.2	二元结构体制形成的主要原因	/146
6.2.3	改革开放后二元结构体制的松解	/148
6.2.4	二元结构体制的文化效应	/150
6.3	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城市化	/153
6.3.1	逐渐扩大的城乡差距	/153
6.3.2	快速演进的城市化	/155
6.3.3	城市化与城乡差距的共变特征和趋势	/156
6.3.4	一面临海与贸易发展对城乡关系的影响	/159
6.4	小结	/162
7	结论	/164
7.1	斯密框架是理解中国城乡关系长期历史发展的钥匙	/164
7.2	形成新的城乡融合制度与文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165
7.3	历史研究的启示	/166

参考文献 /168

图片来源 /184

表格来源 /185

后记 /187

1 绪论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原始聚落到现代大都市的巨大变迁。纵观东西方历史,城乡关系既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也是很多学科研究的焦点。城乡关系研究文献的庞杂与实际问题的复杂对应而生。最为关键的问题或许正如恩代格瓦(2004)所说:“了解城乡共生关系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机制,以及在国家发展进程中所处的阶段。”

1.1 背景

对“现代性”的探索和现代化的追求,是贯穿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一条主线。近现代历史表明,城乡关系不但是现代化的关键问题,而且体现并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目标。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演变也对城乡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

1.1.1 现代化、意识形态和城乡关系

1) 现代化与意识形态

现代(Modern)原本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所表述的与中世纪相对立的新的观念体系,它既是一个时间尺度概念,也是反映新时代精神与特征的价值尺度概念(罗荣渠,2004)。现代化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这或许因为它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日本学者富永健一 2004 年曾列举了现代化的八种含义,如“崭新的”、“进步的”、“工业文明的”、“资产阶级的”等。“现代”往往意味着符合并追求“先进”,所以在价值观层面,“现代化”这个词代表了人们追求“发展”的理想和诉求,隐含着“与时俱进”的涵义。就其内容来看,现代化涵盖甚广,涉及不同层面,并且随着人们的认识而不断增添。

近 30 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也高速演进,加之扑面而来的“后现代”浪潮,使得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正如张志伟(2006)所言:“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古、今、中、外’的时空交错,使得原本存在时空差距的问题突然间同

时出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试图通过几十年的时间来达到西方经过几百年而达到的成果,这自然而然就使原本应该在几百年间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集中体现在这几十年中,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往往会激化另一个矛盾。”所以,虽然对现代化概念仍然存在着多种不同理解,但现代化一词因其集中反映了这种时空矛盾,而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就现代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从单一地强调城市化和“西方化”到强调意识形态的转变。如罗杰·李(Roger Lee)认为:“发展地理学把现代化看作定位于外部市场的城市增长极网络的创建和扩展过程,创新和发展因而会在全国性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扩散。”(约翰斯顿等,2004)这种观点把城市化等同于现代化,但是城市化仅是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要全面概括这种转变,这个词无疑是现代化。罗杰·李认为现代化是“富有的、表面上更先进社会的特征在表面上不先进社会的扩散和接受而产生的社会变化过程”(约翰斯顿等,2004),这无疑将“西方化”等同于现代化,而忽视了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和现代的矛盾及其斗争的复杂性。正如塞缪尔·亨廷顿(1998)指出:“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奈特·毕乃德(1996)认为广义的现代化指“一种过程,社会通过这一过程更换了人们认为不再适用的制度、思想和习惯”(西里尔·布莱克,1996)。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996)则直接强调了现代经济增长应该“基于不断进步的技术以及它所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调整之上”。这必然将现代化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意识形态是一种群体认识或道德意识,它强调思想观念与价值观的根本决定性(比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属于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①。实际上,马克思很早就注意并强调了这种关联,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做了深度阐发。一篇总结马克思与现代化的论文指

^① “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最初被启蒙运动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在1796年用来描述一种新的、严谨的‘观念的科学’,它克服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偏见,可以作为公共教育的新的基础;19世纪才被赋予消极和贬低含义,对此,马克思是有贡献的”(约翰斯顿等,2004)。道格拉斯·诺思(1994)阐述了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三个方面:一种节约机制,人们能通过这种“世界观”认识他所处的环境,从而使决策过程明了;不可避免涉及价值和道德判断(对收入分配的“恰当”评价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人们经验与其思想不符合时,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但会有一个矛盾的积累过程。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科斯等,1994)。

出：“(西欧)现代化的根源，马克思认为是城市‘公社’运动……在具有个人主义伦理观的自主、自治群体创立基础上的‘市民社会’是现代化所必要的先决条件；即使在其他方面都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的城市市民文化，现代化也是要失败的。”(什洛莫·阿维内里，1993)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对现代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并列为国家发展目标的思想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就已孕育，但是将二者结合为一个奋斗目标却是在改革开放后。1954年6月，毛泽东(1977)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同年9月的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简称，后文同)，他又将该目标细化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这种工业化和现代文化相结合的目标与马克思和库兹涅茨等对于现代经济增长及其基础的诠释是契合的。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与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结合起来；在同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四个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蓝图被重申(金冲及，1998)。从1964年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到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都把“四个现代化”作为主要奋斗目标，但是直到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简称，后文同)，才把党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概括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此后的政府工作报告、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决议文件中无一例外地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奋斗目标提出，并且往往固定出现在文本末尾号召性的语句中。这个变化或许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前我们至多将现代化理解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和途径，而之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则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意识形态整合在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和过程之中。因为，仅从时间上看，中国追寻现代化要远远早于追寻社会主义。

2) 现代化、意识形态与中国的城乡关系

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无论是作为整个国家的奋斗目标，还是个人的发展要求，现代化是贯穿中国发展历程的一条主线。在此过程中，传统和

现代的矛盾斗争一直存在并且仍在继续。城乡关系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现代化理论家西里尔·布莱克(Cyril Black)、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等都着重强调了城乡关系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西里尔·布莱克等(1983)指出:“考察一下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中的居住形式就可以看出,城市化的速度是截然不同的……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和变化是区分过渡性社会的另一个根据。”吉尔伯特·罗兹曼等(1998)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向着重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巨大转变”,但“随着中国日趋现代化,城乡差异并没有呈现出缩小的苗头……城乡差别似乎变得更为显著了”。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1996)的报告强调“城乡矛盾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2004)更鲜明地指出:“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两个突出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难题。”

意识形态是影响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中国正如其他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一样,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比先进城市和落后农村之间存在着差别的问题更紧迫了;这一差别,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还表现在观察问题的态度上(它对于公共政策的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含义)”(莫里斯·迈斯纳,2005)。这段话在强调中国城乡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的同时,尤其暗示了意识形态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影响。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1997)如此勾勒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面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城市化大发展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既是文明和历史的进步,又带来城乡对立、东西方对立等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1997)对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做出了指示: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城乡关系的历史基础和特征不同,而且发展历程和目标取向也不一致。因此,消除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

的“城乡对立”就自然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一直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正如林(Lin, 2002)指出:“自从1921年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城乡关系的重要性,并将其并入政治战略……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国际和国内环境变化使城乡关系的侧重点随之改变,但政府始终把城乡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而纳入发展战略。”早在1949年,很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如周恩来)就认识到“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并确立了以农业和乡村为基础,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97)。1950年,毛泽东(1977)宣布把党的工作由农村转向城市,并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将农、轻、重的关系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其后户籍制度的出台、农村公社以及两次城镇向农村的人口倒流被西方学者认为是具有“反城市化”性质的(Kirkby, 1985)。但是不管这些政策的效应如何,对城乡关系问题的重视一直延续至今。针对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继中共十六大(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简称)提出了“缩小城乡、工农、地区三大差别”的目标之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统筹城乡关系”置于“五个统筹”之首,“十一五”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简称)对“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了专门部署,并且开始付诸实践。

综上所述,城乡关系不但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问题,而且体现并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目标。近代以来,以“消除城乡对立”为主要目标之一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和建设,在中国是整合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过程中的。因此,城乡关系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城乡关系是否协调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成功实现的主要检验标准。

1.1.2 全球化和信息化

除了受现代化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历史特征,城乡关系也面临新的环境,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全球化和信息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两种重要思潮和变化趋势。对于它们到底是扩大还是缩小了城乡差距等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一个共识是它们对城乡关系已经并且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化“是一种思考现代和当代社会的普遍方式……它已成为一个‘关键词’,并反映了某种思潮”(Johnston et al, 2002)。全球化概念不仅

代表着一种“世界性”认识的形成趋势,而且是人们对跨国界、区域乃至空间界限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活动的综合刻画。然而,它“并非某种不可避免的终结状态,而是一组复杂、不确定的过程,很不均衡地发生在时空之中”(彼得·迪肯,2007)。

198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也积极参与了全球化的过程(陆大道等,1997)。全球化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是多层面的,但总体效果的评价一般分为两种。多数研究倾向于全球化将拉大城乡差距。如万广华等(2005)的实证研究认为全球化对中国地区差距的贡献显著为正,并且随时间加强;资本和非国有化经济改革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显著,且重要性在增加;地理、教育、城市化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在减弱。实际上,他们分析的指标如城乡居民收入、非农业人口数等反映城乡关系状况。

一些少量的但值得重视的研究认为全球化将缩减城乡收入不平等。魏等人(Wei et al,2001)对中国1988—1993年一百多个城市贸易开放度和城乡收入比的数据分析证明全球化与收入不平等是一种反向关系。他们指出:这是他们引入基于地理的工具变量方法去纠正区域贸易开放度可能的内生化的结果。虽然一个比较苛刻的评论认为他们的“研究所控制的变量太少,而中国不同的城市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等各方面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这就使得其所得到的结论的可靠性下降了”(陆铭等,2004)。但是研究者们将地理、贸易和城乡差距结合研究的做法却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思想契合。虽然他们在地理上只采用了与(上海和香港)出海港的距离这一指标来刻画地理对贸易的影响程度有些单一,但是从(包含农村的)大城市这个区域尺度去看可能更贴近(城市和乡村组成区域的)现实。这种思路和视角非常值得借鉴。另外,克鲁格曼等人(Krugman et al,1996)认为封闭式的国内贸易易导致中心大都市的巨型化,开放和自由贸易将会缩减这种程度。

最近十多年信息化(国外称之为信息和通讯技术,即ICTs)的快速推进,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生活(刘卫东等,2004)。信息化对于城市和乡村的影响,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信息化对城市的影响。1980年代初的一些未来学家[如艾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提出的城市将被“电子村庄”代替的观点,近年来更以“地理的终结”、“地理的死亡”等比较耸人听闻的提法复活(Graham,1998)。但有更多的研究证据表明电话、网络、手机和其他通讯技术的发展与城市化也呈正相关关系(阿瑟·

奥沙利文,2003)。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针对发达国家。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信息化还对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有重大影响。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很多研究倾向于信息化将拉大城乡差距。联合国信息与通讯技术任务小组的一份关于“非洲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特征”的报告指出:“由于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远优于农村(如非洲超过75%的电话线集中于城市),人口在城市的集聚和农村的散居使得信息技术在农村很难扩散,电力及其他动力设备供应不正常甚至缺乏,信息产品的高额进口关税,交通不便等成为信息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和主要障碍。”(Jensen,2002)这似乎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乡信息化面临的普遍问题。但通过对上述基础设施和体制方面的改善,信息化对城乡协调发展应该有一种促进作用。

总之,全球化趋势下自由贸易度加强,从而加强了贸易对城乡发展的影响;而信息化也将从技术层面对城乡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在历史和现代诸多要素及其变化影响和制约下的城乡关系问题,需要新的思考和认识。

1.2 问题

1.2.1 如何看待城乡关系

不同学科和领域对于城乡关系,以及城乡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城乡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的看法不同。

大多数经济学家把城乡关系问题主要归结为城乡差距,关注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影响(林毅夫等,2002;蔡昉等,2000;蔡昉,2003;2007;陆铭等,2004)。他们普遍认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和与此匹配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制约城市化并导致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这些理论的根源是阿瑟·刘易斯(1989)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型和利普顿(Lipton,1977)的城市偏向理论。但是,在具体解释城乡差距产生和扩大的原因时,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堪布尔等人(Kanbur et al,1999)以及万广华、陆铭和陈钊(2005)认为全球化或开放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魏等人(Wei et al,2001)则认为全球化会缩减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市化与城乡差距变化关系的结论也模棱两可。如陆铭、陈钊(2004)分析1987—2001年省级面板

数据认为城市化会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他们同时认为中国城市化也可能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社会学家更多地从微观角度,以村镇为主要考察对象,强调阶层、身份、社区、家庭、权力、宗教信仰等在城乡的不同特征及其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效应。这方面最具代表性和有影响力的是因《江村经济》等一系列社会学著作而知名的费孝通,他特别指出“由于中国传统市镇发展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近年来的巨大变革使城乡关系已脱颖而出,成了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城乡关系不但把分散的自成一个社区的许多农村联系了起来,形成一种有别于农村的市镇社区”(费孝通,2001);同时它的社会文化内容既与农村有联系又有所区别。基于此,他提倡并坚持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战略。

城乡关系也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命题。经济地理学家普遍认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演变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空间差异。埃德加·胡佛(1990)曾引证美国城乡收入相对变化,城市与乡村相对收入比(以城市为100),1929年为100:43,1940年为100:46,1950年为100:62,1960—1970年代为100:67;而同期的城市化水平,由1930年的56%上升到1950年的64%,1970年则增长到74%。可见,城市化水平与城乡差距之间不但存在阶段性的共同变化的趋势,而且从长期来看,随着城市化水平达到较高程度,城乡差距会随之缩小。

虽然研究侧重点不同,但是由于现实的城乡关系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不可分离,所以上述研究视角经常交织在一起。而且,“国内研究还以经济角度为主,社会角度为辅;国外研究重点已转移到社会地理”(马远军等,2006)。现实的城乡关系问题是复杂的,单一视角妨碍了我们更加全面和深刻理解城乡关系问题的实质。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本书试图提出新的认识角度和方法。

首先,城乡关系是个历史问题。从图1-1可见,1952—2011年,中国城市消费水平一直是乡村的两倍以上,而且波动很大。虽然198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消费比在逐年扩大,1990年代后更是一直处于三倍以上,但较大的城乡差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就已存在,并且一直处于不平稳演进的状态。这种状态甚至可以追溯至中国近代史的发端时期^①。

^① 鸦片战争后,以往均衡的城乡关系被打破,通商口岸城市快速地接受了西方文明并发展起来,然而传统乡村发展极为缓慢,逐渐形成了二元结构。费正清等(1994)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并指出中国现代化所要解决的正是这种二元结构,而非只注重少数大城市。